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一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

元代文獻攷釋與歷史研究——稱謂篇

洪金富*

元代制度雜揉胡漢，迥異唐宋。固守傳統智識，對待元代事物，其扞格難入，易滋誤會，宜也。本文舉太后、太子、太上皇、太皇太后等詞為例，援引漢、蒙、波斯等文獻資料，說明傳統稱謂詞彙在元代發生意義變化的始末因緣，以及固守傳統文義來解讀元代文獻已經產生的荒謬錯誤。

關鍵詞：元代史 稱謂詞 皇太子 太皇太后 詞義變化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緣起

治中國古代史，常有文獻不足，不能言之之歎；治中國近代史，則有史籍浩瀚，不能勝讀之煩。研究元代歷史，困擾少在文獻的多寡，多在文獻的難讀。

今傳元代文獻，以漢文爲大宗，蒙文次之，其他文字又次之，彼此或可相互證補和勘正，爲元史研究者獨闢一塊工作大園地。茲所欲論者惟漢字文獻，他不及焉。爲便利討論，姑將元代漢字文獻粗分三類。一是純粹的漢文，二是夾雜譯語（即今外來語）的漢文，三是直譯自蒙文的漢文。假使漢學根柢深厚，又且熟諳譯語、精通蒙文，則三類文獻自無難讀之可言。但是，今傳元代文獻內，傳抄傳刻的錯誤，無法校勘訂正者，仍然不少，於是乎正確解讀，不易也。更有甚者，元朝的典章文物制度，一方面既沿襲唐宋遼金舊制，一方面又遵循蒙古固有傳統，多方交會，胡漢雜揉，面貌迥異於往昔，治史者倘若蒙昧於此，一味以固有智識來解讀元代文獻，其不能甚解，必然也。

我讀元代文獻，不能了然者所在多有，理解與他人異者，間或有之。今已遺忘殆盡，所剩無幾。茲就記憶所及，拈出若干，討論於後。所學文獻，以能反映元代前述特殊性者爲主。個人經驗，或可備引用元文者之參攷。其傳抄傳刻上的問題，雖事關重大，亦摒棄不論。¹ 茲篇所述，以稱謂稱詞如太后、太子、太上皇、太皇太后爲範疇。其與稱謂詞無關者，則另文討論。

¹ 如世祖至元八年頒布的〈戶口條畫〉，《元典章》作「再行添額」，《通制條格》作「再不添額」，一字之差，意義全反。最早指出這一字之差的，可能是愛宕松男，見所撰〈蒙古人政權治下の漢地に於ける版籍の問題——特に乙未年籍・壬子年籍及び至元七年籍を中心として——〉，《羽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0）；不著撰人，《大元聖政國朝典章》（以下簡稱《元典章》，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印元刻本，1972）；不著撰人，《大元通制條格》（北平：北平圖書館影印明初墨格寫本，1930）；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又如程鉅夫《雪樓集·遺音堂記》，洪武本作「左司唐兀公」，四庫本作「左司畏兀公」，一字之差，族屬不同。楊鐮以後者爲正鵠，見所著《貫雲石評傳》（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頁102，註1；洪武本《雪樓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四庫本《雪樓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第1202冊）。

二・太上皇、唐妃

請從一個普通詞彙說起。《元史·順帝紀二》，重紀至元三年十二月壬午(1338.01.07)條載：

壬午，集賢大學士羊歸等言：「太上皇、唐妃影堂在真定玉華宮，每年宜於正月二十日致祭。」從之。

太上皇一詞意指在位皇帝的父親。這是太上皇的傳統含義。出現在〈順帝紀〉中的太上皇，想必不疑有他，非順帝之父明宗莫屬。太上皇既為明宗，太上皇之後的唐妃，自然就是明宗的皇后。查《元史·后妃傳》，明宗皇后有傳者兩位，一是順帝異母弟寧宗的生母八不沙皇后；一是順帝的生母貞裕徽聖皇后邁來迪。²〈順帝紀〉上的唐妃，於是乎就被認定是明宗貞裕徽聖皇后。《元史人名索引》和《元史辭典》就是如此。³

暫且不提太上皇、唐妃的真實身分，且讓我們引用關於唐妃的另外一則文獻——樹立於河北趙州（今趙縣）的《太清觀懿旨碑》。碑文起首是：

長生天的氣力裏，谷裕皇帝福蔭裏，唆魯古唐妃懿旨……

谷裕是貴由的異譯。碑末署「丁未年二月□日」，即定宗貴由皇帝即位之次年，一二四七年。《全元文》全文轉載該碑文及另一樹立於陝西盤石的〈重陽延壽宮牒〉文。點校者所寫作者簡介說，「唆魯古唐妃，定宗之妃也。本書收唆魯古唐妃文二篇」。⁴

按：唆魯古唐妃是蒙文 Sorqaytani Beki 的對譯。Sorqaytani 是人名，有多種音譯，唆魯古唐是其中之一；Beki 是尊稱，音譯或作別吉，或作別乞，⁵ 用於

² 我尚未能確定明宗有幾位后妃。《元史》卷一一六〈后妃傳一〉有傳的只此兩人。卷一〇六〈后妃表〉明宗位下著錄七人，但她們未必都是明宗的后妃。請注意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卷一〇六〈校勘記九〉內的一段文字：「本表所列各后妃，係按幹耳朵區分，繼承某帝幹耳朵者，即列名于該帝位下，並非必為該帝后妃。世祖位下速哥答里皇后，係繼承守宮，領受世祖歲賜者，實為泰定后。表前言所云『其居則有曰幹耳朵之分；沒，復有繼承守宮之法。位號之淆，名分之瀆，則亦甚矣』，即指此。」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

³ 姚景安，《元史人名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26。邱樹森主編，《元史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詞目「唐妃」及「貞裕徽聖皇后」；頁689, 583。

⁴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28冊，頁1-2。

⁵ 別吉，宋人趙珙譯作驚拽，明人譯作比妓，紙上醜詆敵人，阿Q也。趙珙，《蒙鞑備

婦女時，意爲妃，或公主。唆魯古唐妃就是 Sorqaytani Beki 的音譯加意譯。唆魯古唐妃後來簡化爲唐妃。唐妃這個譯名，既保留了全名的一個原音 (-tan-)，又表示了該人的身分（妃），同時又合乎漢人的稱謂習俗，不愧爲元朝人創造出來的一個出神入化的神來之譯。然而，「唐妃」何許人也，當代人知道，我們今天卻必須費神來辨認，而且還可能張冠李戴，指鹿爲馬。

近刊拙文〈唐妃娘娘阿吉剌考〉⁶ 蒐羅眾多史料，反覆論證唐妃就是 Sorqaytani Beki，亦即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 (Tolui) 之妻，可謂鐵證如山，毫無疑問。《元史人名索引》誤認唐妃爲明宗的皇后，根本原因在於以傳統含義來理解紀文中的太上皇之故。編者假如能夠警覺到「唐妃」這一稱謂和貞裕徽聖皇后的名字「邁來迪」毫無語音對應關係，⁷ 或者能夠查明明宗帝后的影堂在大都的黑塔寺，而非真定的玉華宮，或者知道真定玉華宮內的影堂祭祀對象爲拖雷和唐妃夫婦，而非明宗帝后，則可發現前引〈順帝紀〉文中的太上皇並不必然指稱順帝的父親，那麼，將元室第二代拖雷夫婦誤認作第七代明宗夫婦的錯誤應可避免。

《全元文》將唆魯古唐妃說是第三代定宗之妃，可能是因爲碑末繫年丁未爲定宗谷裕二年，且碑文中谷裕皇帝和唆魯古唐妃兩個名字緊緊相隨之故。點校者似乎未能意識到碑文起首那幾個字其實就是蒙元時代官方文書發展中的起首語，其中所見皇帝和后妃未必就是夫妻。這類起首語，故師柯立夫教授 (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 近三十年前曾撰文討論，稱之曰 Initial Formulae。⁸ 蒙古語

錄·太子諸王》條：成吉思皇帝「女七人，長公主曰阿其（引者按，「阿真」之誤）繫拽，今嫁豹突駙馬」；見王國維，《蒙古史料四種校注》（北平：清華學校研究院，1926），總頁438。趙珙，一二二一年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見到木華黎 Muqali 國王。Muqali，趙珙譯作沒黑肋。李禿，趙珙譯作豹突。明譯比妓散見，茲舉一例：《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傳〉：「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於俺答妻一克哈屯 (yeke qatun)。長娶大成比妓不相得。」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頁5839。

⁶ 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41-62。

⁷ 該后史料極闕。《元史》本傳只有寥寥數語：「明宗貞裕徽聖皇后，名邁來迪，生順帝而崩。文宗立，諡貞裕徽聖皇后。」追諡尊號時間尚且有錯；見卷一一四，〈后妃傳一〉，頁2877。

⁸ "The Initial Formulae in a Communication of a Mongolian Viceroy to the King of Korea," *Journal of Turkish Study* 3 (1979): 65-88.

專家照那斯圖教授 (Junast) 稱之爲「起首語」。⁹ 聖旨、懿旨等蒙文文書的起首語有一發展過程。大致而言，世祖之前（不含世祖時代）和世祖以後（含）的起首語稍有差異。¹⁰ 茲先將世祖以後八思巴字蒙文聖旨、懿旨起首語的漢語白話譯文抄錄如下：

聖旨——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聖旨”原文爲 jarlig）

懿旨——長生天氣力裏，皇帝福蔭裏，皇（太）后懿旨（“懿旨”原文爲 idzi，係漢語借詞）¹¹

前揭聖旨起首語意思是，靠長生天的氣力，托大福蔭的護助，皇帝的聖旨，與元代漢文文言「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及明清時代「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相彷彿。懿旨則意爲靠長生天的氣力，托皇帝的福蔭，皇后（或太后，或妃子）的懿旨。¹² 相較於皇帝聖旨、太子令旨、帝師法旨等，懿旨的起始語在世祖之前者與以後者，差異較大。以下依時代序抄錄若干道如下：¹³

(1) 皇帝聖旨裏，依舊行東宮事，也可合敦大皇后懿旨並妃子懿旨

《河南濟源天壇十方紫微宮懿旨碑》(1240)

(2) 皇帝聖旨裏，公主皇后懿旨

《汲縣北極觀懿旨碑》(1245)

(3) 長生天的氣力裏，谷裕皇帝福蔭裏，唆魯古唐妃懿旨

《趙州太清觀懿旨碑》(1247)

(4) 天底氣力、大福蔭護助裏，公主皇后懿旨

《濟源靈都宮懿旨碑》(1250)

⁹ 照那斯圖，《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II·文獻匯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1991），〈引言〉，頁1。

¹⁰ 本文句式，例如：世祖之前、前，不含世祖；以前，含世祖。世祖之後、後，不含世祖；以後，含世祖。簡言之，有以字者含，無以字者不含。

¹¹ 據照那斯圖，《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II·文獻匯集》，〈引言〉，頁1。

¹² 彭大雅，《黑韃事略》（收入王國維，《蒙古史料四種校注》），總頁488：「其常談，必曰：托著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一二三三年，鄒伸之出使蒙古商議攻金事，彭大雅同行，歸後記其見聞，著為《黑韃事略》。一二三五年，鄒伸之再使蒙古，徐霆同行，越明年歸，取彭書疏證之，次年孟夏歲事。

¹³ 祖生利，《元代白話碑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語言系博士學位論文打印本，2000），下篇，〈元代白話碑集錄校注〉收錄一百一十八碑文，校注詳實，值得參考。不熟元代白話碑文者透過校注，應可了解碑文的意思。以下九道懿旨起首語，除第三碑外，全據該書轉錄，不另注原碑出處。八碑見頁12, 21, 31, 34, 89, 93, 102, 133。第三碑請見拙文〈唐妃娘娘阿吉剌考〉，頁48。

(5) 天底氣力，大福蔭裏，唆魯古唐妃懿旨裏……

《涇陽重陽萬壽宮給文碑》(1250)

(6)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福蔭裏，皇太后懿旨

《靈壽祁林院懿旨碑》(1298)

(7) 天地的氣力裏，皇帝福蔭裏，皇后懿旨

《靈壽祁林院懿旨碑》(1301)

(8)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福蔭裏，皇太后懿旨

《滎陽洞林大覺禪寺懿旨碑》(1309)

(9)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福蔭裏，皇太后懿旨

《易州龍興觀懿旨碑》(1309)

觀察前引，可以發現蒙元時代懿旨起首語有一格式化的趨勢。遣詞用字明顯走向固定。世祖之前的懿旨裡，還可見到在任皇帝的名字 (3) 以及懿旨頒布者的名字 (3, 5)。懿旨頒布者可以是皇太后，可以是妃子，未必就是皇后。以唆魯古唐妃為定宗裕的皇后，事涉疏忽。例 (1) 中「也可合敦 (yeke qadun) 大皇后」(音義疊譯) 究竟是太宗的孛剌合真皇后 (Boraqjin) 或脫列哥那皇后 (Töregene, 1242-1246稱制攝政)，《元史》的「六皇后」是否為「大皇后」之誤，十多年前引發中國社會科學院蔡美彪先生和澳洲國立大學羅依果教授 (Igor de Rachewiltz) 的熱烈討論，這才是真正的難題。再者，一因聖旨、懿旨等文書絕少出現頒發者之名，二因多數文書使用十二生肖紀年，確定誰是頒發者以及辰屬(如羊兒年)的具體年代，有時還頗費事。例如例 (9) 的結尾署「雞兒年十一月初十日，大都有時分寫來」云云，蔡美彪疑此雞兒年為一三二一年，英宗至治元年辛酉。¹⁴ 照那斯圖認為「這份懿旨的雞年或是至大二年 (1309) 己酉，或是至治元年 (1321) 辛酉。而多數學者認為屬後者」。¹⁵ 祖生利博士引述蔡、照二氏之說後，頗疑此雞年為一三〇九年，「但因無直接證據，姑暫從眾說」。¹⁶ 審慎態度，反映正確解讀元代文獻並非易易。

¹⁴ 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頁78。

¹⁵ 照那斯圖，《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II·文獻匯集》，頁118。

¹⁶ 祖生利，《元代白話碑文研究》，頁134，注18。祖生利的懷疑有其道理。答己 (Dagi) 太后此一雞年懿旨，我亦認為頒布於一三〇九年。答己太后別有一猴年懿旨，現存西藏文管會，照那斯圖認為此一猴年為一三二〇年庚申，我疑為一三〇八年戊申。請容另文考述。

三・太后、孛兒帖夫人

讀元代文獻，見太上皇云云，不能不假思索以爲即當今皇上的父親，已如前述。見太后云云，亦不能遽斷爲今上之母，我亦有說。《元史・太宗紀》，八年丙申秋七月條云：

詔以真定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幹魯朶：拔都，平陽府；茶合帶，太原府；古與，大名府；孛魯帶，邢州；果魯干，河間府……¹⁷

按蒙古滅金（1234）後，在漢地調查戶口，隨即進行有名的丙申年（1236）大分封。¹⁸ 紀文詳載了受封者的名字及其封地所在，而特別把「太后」提出來放在前頭，不與諸王貴戚同列，應有其緣故。暫且不表。這位太后，就是前文所說的，成吉思汗第四子睿宗拖雷之妻莊聖太后唆魯古唐妃。但是，有人說她是太宗的太后，即太宗之父成吉思汗之妻孛兒帖。乾嘉大學者，元史名家錢大昕（1728-1804）即持此說。《廿二史考異》卷八六〈元史一・太宗紀〉有一條說：

七月，詔以真定民戶，奉太后湯沐。按：〈食貨志〉：「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丙申年，分撥真定路八萬戶。」蓋太后湯沐之邑，後為睿宗所有。¹⁹

錢氏顯然以爲真定湯沐邑，原爲太宗的太后即孛兒帖所有，後歸孛兒帖之子睿宗拖雷。但是，我將證明，丙申年分封時，孛兒帖、拖雷母子早已先後亡故多年，並不是真定分地的受封者與繼承者。錢氏誤認「太后」爲孛兒帖，後來的沈濤和屠寄，也誤認「太后」爲孛兒帖。眾口可以鑠金，真相不容埋沒。諸家的說法，不能不加辨正。

¹⁷ 《元史》卷二，頁35。為閱讀下文時便利參照，茲將該紀文全文轉錄如下：太宗八年「秋七月，……詔以真定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幹魯朶：拔都，平陽府；茶合帶，太原府；古與，大名府；孛魯帶，邢州；果魯干，河間府；孛魯古帶，廣寧府；野苦，益都、濟南二府戶內撥賜；按赤帶，濱、棣州；幹陳那顏，平、濮州；皇子闊端、駙馬赤苦、公主阿剌海、公主果真、國王查剌溫、茶合帶、鍛真、蒙古寒札、按赤那顏、坼那顏、火斜、朮思，並於東平府戶內撥賜有差。耶律楚材言非便，遂命各位止設達魯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頌之，非奉詔不得徵兵賦。」

¹⁸ 請詳拙撰〈從「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權的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4（1987）：843-907。

¹⁹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3冊），頁1623。

沈濤（約1792-1855），號匏廬，江蘇嘉興人，嘉慶舉人，官至道員。學尚考訂，兼嗜金石，嘗任正定知府，編有《常山貞石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序）。該志卷一五收錄趙從證撰〈大朝國師南無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龍興寺功德記〉，²⁰ 沈氏按語云：

真定始為太宗太后湯沐邑，事在太宗八年丙申，見〈太宗紀〉；而〈食貨志〉載：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丙申年分撥真定路八萬戶，與紀所稱憲宗分封諸弟年分不合。以理度之，其地始為太后湯沐，後為睿宗所有。睿宗崩，因以授阿里不哥。

屠寄（1856-1921），字敬山，江蘇武進人，光緒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京師大學堂正教習等職，長于史地之學，尤精蒙古史，著《蒙兀兒史記》一百六十卷（有缺卷）。²¹ 該書卷七四〈阿里不哥傳〉云：

阿里不哥，拖雷第七子，忽必烈汗同母少帝也。游牧和林西北，夏駐阿勒台山，冬駐乞兒吉速，即其母莎兒合黑塔泥分地，寬廣馬行三日程，其祖母孛兒帖可敦湯沐八萬戶在真定者，身後歲賦亦入阿里不哥。據〈食貨志〉補

沈、屠二氏既錯認《元史·太宗紀》的太后於先，又見《元史·食貨志》記載真定分地與紀文相衝突於後，為解決矛盾，調和紀志，於是殫精竭思，多方設想，衍生出許多是非，寫下了前引的兩段文字。為方便討論，茲將相關志文——《元史·食貨志·歲賜·諸王》第六至九條、及二十一至二十五條等九條——節錄如下，條文前數字為我所加：

(6) 太祖長子朮赤大王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平陽四萬一千三百二戶。

(7) 太祖次子茶合解大王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太原四萬七千三百三十戶。

(8) 太祖第三子太宗子定宗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大名六萬八千五百九十三戶。

²⁰ 該碑尚存，在隆興寺慈氏閣內；見張秀生等編著，《中國古代建築：正定隆興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23；碑文見沈濤，《常山貞石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18冊，據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序刊本影印），卷一五，頁18b-23a；沈氏按語見頁24b-25a。

²¹ 參看余大鈞，〈論屠寄的《蒙兀兒史記》〉，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219-230；屠寄，《蒙兀兒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七四，頁1a。

- (9) 太祖第四子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真定路八萬戶。
- (21) 睿宗子旭烈大王位：……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彰德路二萬五千五十六戶。
- (22) 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見前。
- (23) 睿宗子末哥大王位：……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彰德河南府五千五百五十二戶。
- (24) 睿宗子撥綽大王位：……五戶絲，丁巳年，分撥真定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戶。
- (25) 睿宗子歲哥都大王位：……五戶絲，壬子年，元查認濟南等處五千戶。

請先說一個小問題。按《元史·憲宗紀》並無憲宗分封諸弟之記載。沈濤所謂阿里不哥分撥真定路八萬戶年代「與紀所稱憲宗分封諸弟年分不合」云云，不知何所據。據前揭〈食貨志〉所載分封年分，獨阿里不哥作丙申年（1236），時太宗（1229-1241）在位；餘三人作丁巳年（1257），一人作壬子年（1252），時憲宗（1251-1259）在位。頗疑沈氏按語所謂「與紀所稱」之〈紀〉，為〈志〉之誤。

沈、屠二氏認定前揭〈太宗紀〉的太后，為太宗之母，成吉思汗的孛兒帖夫人（Börte Qadun），顯然是以傳統詞義來了解太前一詞所致。兩人似乎都不曾考慮孛兒帖夫人當時是否在世的問題。孛兒帖夫人（1161-?）年長成吉思汗一歲。鐵木真稱汗時（1206），孛兒帖尚在世。她比成吉思汗早卒。²² 成吉思汗卒於一二二七年，下距太宗丙申年（1236）已經十年，太宗分封中原民戶給與亡故多年的母親，十分蹊蹺。即使孛兒帖夫人活到一二二七年，這時金朝尚未滅亡，仍然苟延殘喘於河南，華北依舊是大亂的局面，天下未靖，根本不可能進行分封，孛兒帖夫人豈有封地可言。沈濤認為真定分民，原為孛兒帖所有，後歸第四子拖雷，卒後為幼子阿里不哥所繼承，前後三主。但是，拖雷卒於一二三二年，金朝未亡，蒙古人尚未分封中原，拖雷如何死享封地？屠寄似乎認為孛兒帖死後，真定分地直接落入阿里不哥手中，僅一易其主。但是，孛兒帖卒時，阿里不哥（一

²² 孛兒帖夫人的生卒年代，請參看 Igor de Rachewiltz, e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4), vol. I, p. 334.

二一九年以後某年生，一二六六年卒）至多才八歲。²³ 中原諸州命運未定，還在群雄角逐中，孛兒帖夫人根本無所謂分地留給稚孫來繼承。退一步說，真定分地即使原屬他人，而後改歸拖雷一家，文獻應當有所反映，因為真定分民多達八萬戶，創歷次分撥個人戶數最高記錄，所有權的移轉，絕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國家大事，豈容蛛絲馬跡灰滅盡淨，一無可尋。

錢、沈、屠三氏顯然都沒有發覺前揭〈太宗紀〉受封者名單，竟然不見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家族的人。按名列第一的拔都 (Batu, 1209-1256)，是太祖長子朮赤 (1177-1225) 之子，丙申年分封時朮赤已亡（與父汗同年卒）。第二茶合帶，即察合台 (?-1242)，是太祖次子，丙申年尚在。第三古與，即前文的谷裕，後來的定宗貴由汗，父親太宗窩闊台是太祖的第三子，分封當時的可汗。拔都、茶合帶、古與，名單中的一、二、三名，依序代表成吉思汗與孛兒帖夫人所生長、次、三子的家族。²⁴ 名單中沒有第四子拖雷家族的人。拖雷戰功彪炳，聲望很高，太祖死後，一度攝政。由於他的禮讓，三兄窩闊台才能順利繼位。他死於分封前數年，一二三二年。其妻也就是前文一再提到的唆魯古唐妃。唐妃在夫死之後，力撐門戶，終於把自己的兒子蒙哥送上皇帝的寶座（憲宗，1251-1259），無意中為蒙哥之弟忽必烈（世祖，1260-1294）建立元朝預先鋪置了舞台。²⁵ 乍看名單，丙申年分封沒有拖雷家的份。這是十分奇怪的事。事實不然。名單中確實沒有拖雷家的人名。但是，拖雷家的確有其代表，只是此一代表不是以個人名字出現，而是以一個平常的漢語詞來表達，那就是「太后」。〈太宗紀〉受封者名單前的太后，前面說過，不可能是太宗之母孛兒帖夫人，因為當時她已死去。²⁶ 湯沐邑為真定的這位太后，當另有其人。她肯定就是拖雷之妻唐妃。首先，許多史料可以證明真定就是拖雷家族的，不是其他任何人的采邑。²⁷

²³ 孛兒帖夫人比成吉思汗（一二二七年卒）早卒。阿里不哥胞兄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分別生於一二〇九、一五、一八年。故阿里不哥當生於一二一九年以後。假如孛兒帖夫人卒於一二二七年，則阿里不哥年方八歲。孛兒帖夫人卒年更早，則阿里不哥年紀更小。

²⁴ 孛兒帖夫人遭蔑兒乞人擄走後，被配給赤勒格兒力士 (Čilger Bökö) 為妻。她的長子朮赤 (?-1227)，時人懷疑非成吉思汗之子。

²⁵ 請詳拙文，〈唐妃娘娘阿吉剌考〉。

²⁶ 考訂名單上諸人身分和生卒年代，需要一點篇幅，請容另文為之，茲不具述。

²⁷ 茲僅自《元史》舉數例。一，卷一五三，〈王守道傳〉，頁3613-3614：「後擢慶源軍節度使。天澤為五路萬戶，署守道行軍參謀，兼檢察使。莊聖太后以真定為湯沐邑，守道在鎮，以幕僚頻歲致覲，數對稱旨，得賜金符、錦衣、金錢。」按天澤授五路萬戶，在

其次，拖雷當時已卒，唐妃尚健在，以遺孀身分代表拖雷家族領受封邑，順理成章。名單中就有女性受封者，何況唐妃自身就是個名女人。

但是，名單不書唐妃名字，而以「太后」稱之，以致後人有所誤解，必有其原因。這是關鍵問題，卻最難回答。名單的本來面貌，我們不復得見。我頗疑原來名單寫有唐妃之名，名列第四，而與其前的三人依序代表太祖正妻所生的長子、次子、三子、四子。《元史·太宗紀》上的次序疑是後來的更動。按〈太宗紀〉史源為今日已佚的《太宗實錄》。該《實錄》纂修於世祖至元年間。²⁸ 唐妃在至元三年（1266）被追諡為莊聖太后，又有別吉太后之稱。²⁹ 她是世祖親母，對世祖及同時代的人而言，她就是太后。這或者就是改唐妃之名為太前一詞的原因。至於排名由第四移到最前面，同時略作文字上的修飾，或者是出於彰顯拖雷家族最為尊貴之故。對當代而言，唐妃、太后，一也，但是，對後人而言，改唐妃為太后，無論是在《太宗實錄》抑或在《元史·太宗紀》，都易導讀者以為她就是太宗的母后。錢、沈、屠三人就是個例。

《元史·太宗紀》太后其人，我的認定既與錢、沈、屠三人異，我也就不必拐彎抹角的去疏通外似矛盾的紀志記載。我的看法很簡單。滅金之後，丙申年分封時，拖雷已死，未亡人唐妃分到了真定路八萬戶做為拖雷家族的領民。後來某一時間，此時唐妃（一二五二年卒）健在或已亡殊難確定，真定分民為唐妃幼子阿里不哥所繼承。因為阿里不哥繼承的是丙申年分封給拖雷家族的民戶，所以

太宗元年己丑（1229，參卷一五五本傳）。據〈王守道傳〉可知，真定一開始就是拖雷家的封地。二，卷一三四，〈小雲石脫忽憐傳〉，頁3262：「小雲石脫忽憐，畏吾人，仕其國為吾魯愛兀赤，猶華言大臣也。太祖時，與其父來歸。從征回回國還，事睿宗於潛邸。真定，睿宗分地，以為本路斷事官。」三，卷一四八，〈董文用傳〉，頁3495：「文用字彥材，俊之第三子也。生十歲，父死，長兄文炳教諸弟有法。文用學問早成，弱冠試詞賦中選。時以真定城奉莊聖太后湯沐，庚戌（1250），太后命擇邑中子弟來上，文用始從文炳謁太后于和林城。」四，卷一六七，〈張璪傳〉，頁3929：「璪業儒，丙辰（1256）歲，平章廉希憲薦于世祖潛邸。時真定為諸王阿里不哥分地，阿里不哥以璪不附己，銜之，遣使言於世祖曰：『張璪，我分地中人，當以歸我。』」據〈張璪傳〉，可知憲宗六年丙辰以前，阿里不哥已繼承真定分地。

²⁸ 參看王慎榮、葉幼泉、王斌，《元史探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頁31-32。

²⁹ 《元史》兩見別吉太后，具謂唐妃。一見卷三八，〈順帝紀一〉，頁826，至元元年三月「丙申，中書省臣言：『甘肅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別吉太后於內，請定祭禮。』從之」。一見卷四四，〈順帝紀七〉，頁927，至正十五年九月「辛卯，命秘書卿答蘭提調別吉太后影堂祭祀，知樞密院事野仙帖木兒提調世祖影堂祭祀……」。

《元史·食貨志·歲賜·諸王》第九條作：「太祖第四子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真定路八萬戶。」〈食貨志〉中的丙申年，是拖雷家族獲得真定分地的原始年分，不是阿里不哥獲撥真定八萬戶的年分。〈食貨志·歲賜·諸王〉第六、七、八、九等四條前揭引文，依序記太祖四子分地所在及分民戶數，年分具繫丙申，意謂四家具在丙申年獲封。這與前文推測的原始分封名單排名次序相吻合。第六條太祖長子朮赤，卒於一二二七年，在丙申年前數載，而該條以朮赤繫名，非謂丙申年分封給朮赤個人，乃言分封給朮赤家族也。《元史·太宗紀》分封名單第一人為拔都，即以拔都代表朮赤家族，非謂分封給拔都個人。³⁰ 朮赤家族分地平陽府，後來被族中諸王、妃子瓜分成六七十塊大小不等的采邑，各自為政。³¹ 這與拖雷家族的采邑由幼子阿里不哥一人獨自繼承有所不同。正是因為阿里不哥既繼承真定分地，而同父諸兄弟則無有，故長兄蒙哥汗在位進行分封時一併撥給旭烈兀等人若干民戶。志中第二一至二五條旭烈兀等人位下年分丁巳、壬子，與阿里不哥位下年分丙申不同，原因在此。明乎此也許可以回過頭來發現〈太宗紀〉中的太后可能不是孛兒帖夫人。原來並無矛盾衝突的紀志記載根本無需多費筆墨去彌縫疏通。層層堆積的假歷史，都是誤認太后惹的禍。³²

³⁰ 明乎此，則知〈太宗紀〉丙申年分封有拔都，而〈食貨志〉不見拔都之名，非紀志矛盾也。

³¹ 請詳拙文，〈從「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權的性質〉，頁873。

³² 按：除了錢大昕、沈濤、屠寄諸人外，韓儒林（1903-1983）亦嘗指《元史·太宗紀》丙申年秋七月所見太后為孛兒帖夫人。他在〈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一文的一條註中說：「這個太后是成吉思汗的孛兒台旭真（引者按，孛兒帖夫人）。按照蒙古幼子守產的舊俗，孛兒台死後，分地（真定路）應由她的幼子拖雷繼承……唆魯禾帖尼（拖雷之妃）死，分地當然由她的幼子阿里不哥繼承。」見氏著，《韓儒林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頁336-337。另一方面，日本著名元史學者箭內互（Yanai Watari, 1875-1926）則指前述「太后」為「太祖皇后之猶生存者」。他在〈元朝斡耳朵考〉一文中說：「所謂太后者，為何帝之后，雖不可知；殆指太祖皇后之猶生存者。故所謂太后湯沐邑，實作太祖斡耳朵之費用而支給者。」見氏著，《蒙古史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30），頁710；陳捷、陳清泉譯，《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頁103。這都是受傳統詞義先入為主的成見之累，誤指前揭史文的「太后」，衍生出來的錯誤歷史解釋。

四・文字陷阱

前文二、三兩節指出，以傳統詞義來解讀《元史》中部分詞彙如太上皇和太后，所可能造成的嚴重錯誤。兩節都涉及一位女性，蒙元歷史上最傑出的人物之一——唐妃。她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正妻，四位皇帝的母親。³³ 由於後人誤讀史文，她一再被錯認，或誤為成吉思汗的孛兒帖夫人，或誤為成吉思汗之孫定宗貴由汗的妃子，或誤為成吉思汗第六代孫明宗和世琜的皇后邁來迪。誤讀史文，咎在讀者，但是，史文不夠明確，易陷讀者於誤解，也有責任。對這類史文，我無暇、亦無需一一追蹤究責。茲僅以拖雷、唐妃夫婦為對象，看看元代其他文獻怎麼稱呼他們，俾便了解前述史文那般寫法的來龍去脈。

據完成於十三世紀前半葉的北亞民族第一部長篇史書《蒙古秘史》（即明譯《元朝秘史》，以下簡稱《秘史》）中，³⁴ 一無例外的使用本名拖雷（蒙語鏡子之意）和莎兒合黑塔泥別乞。³⁵ 成於世祖朝的《聖武親征錄》未見拖雷這一名字。書中有「大太子朮赤、二太子察合台、三太子窩闊台」³⁶ 云云，「四太子」當然就是拖雷。太祖逝世於丁亥（1227），丁亥條有「太祖聖武皇帝昇遐之後，太宗英文皇帝即大位以前，太上皇帝時為太子」³⁷ 云云。《親征錄》行文至此，讀者不難明白太上皇帝就是四太子拖雷。太上皇所指既已明言於先，則後文「上與太上皇」、³⁸「上亦遣使於太上皇」³⁹ 云云，謂太宗與拖雷，非太宗與太祖，明

³³ 長子憲宗蒙哥汗（1251-1259），次子世祖忽必烈汗（1260-1294），三子旭烈兀汗（1258-1265）在波斯建立伊利汗國（1258-1388），四子阿里不哥在憲宗死後稱帝於和林，一二六四年向忽必烈投降，一二六六年卒。

³⁴ 復旦大學姚大力教授近著〈“成吉思汗”還是“成吉思合罕”？——兼論《元朝秘史》的成書年代問題〉，指出，「《秘史》的原始文本分別寫作於1228年和1251年。不過，其續寫部分中有四個段落是元世祖時期增補進去的」，這個最新看法很有見地。姚文載《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100周年》（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6），頁202-219。

³⁵ 《秘史》二七二節二度提到拖雷，稱為 Tolui kö'ün，音譯「拖雷口溫」，旁譯「人名・大王」，請參註72；不著撰人，《元朝秘史》（收入《四部叢刊・三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莎兒合黑塔泥別乞，即前揭 Sorqaytani Beki 的對音。別乞或譯作別吉，意為妃。

³⁶ 不著撰人，《聖武親征錄》（以下簡稱《親征錄》，收入王國維，《蒙古史料四種校注》），頁67b。

³⁷ 同前書，頁98a。

³⁸ 同前書，頁99b。

確無疑也。書中指稱拖雷，唯一可以困惑人的是「四太子也可那顏」⁴⁰ 云云。有人讀為「四太子」拖雷和「也可那顏」兩人，謂也可是成吉思汗侄也苦的異譯，「也可那顏」即也苦官人。⁴¹《元史·祭祀志三·宗廟上·序言》，至元十三年(1276)，「是歲，改作金主，太祖主題曰『成吉思皇帝』，睿宗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皇后皆題名諱」。⁴² 太上皇、也可那顏所指明確，沒有任何懷疑餘地。《元史·祭祀志》可以證明《親征錄》的「四太子也可那顏」就是指拖雷一人。世祖初年，李庭撰《奧屯世英神道碑》，文中有「四大王府」及「皇考四大王」云云，「唐妃」則出現四次。⁴³ 元人梁相撰《大興國寺記》，⁴⁴ 記中有「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云云。所指何人，亦有脈絡可尋，不費猜度。《元史》稱呼拖雷，多用本名，或廟號睿宗，或諡號英武皇帝、景襄皇帝，這是專稱，所指明確，肯定不會被誤認。⁴⁵ 唯一可能遭到誤讀的就是前揭《順帝紀》文內「太上皇、唐妃影堂在真定玉華宮」云云。前述《秘史》《親征錄》以及李庭、梁相碑記文字，不能讓我肯定太上皇（以及四太子、四大王、也可那顏等）已成拖雷的專稱。但是，若非專稱，當集賢大學士羊歸等人提出建議，說到拖雷時，不用他的廟號或諡號或其他明確無疑義的稱謂，卻使用普通詞彙太上皇，難道不怕被人誤解？元末順帝朝成書的第一部北京志書，熊自得所撰《析津志》內有《原廟·行香》篇。篇中有「太上太皇，真定玉華宮」云云。這裡的太

³⁹ 《親征錄》，頁101a。

⁴⁰ 同前書，頁78b。

⁴¹ 同前書，頁78b-79a。王國維注云：「《元史·祭祀志》，睿宗主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是『四太子也可那顏』七字連讀。某氏以哈撒兒子也苦當之，非是。」某氏，蓋謂何秋濤。何氏《校正元聖武親征錄》於「四太子也可那顏」下註云：「也可，即也苦，哈撒兒子。」見何秋濤，《校正元聖武親征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第423冊，據清光緒小滙集刻本影印），頁64b。

⁴² 《元史》卷七四，頁1833。

⁴³ 參看拙文，〈唐妃娘娘阿吉剌考〉，頁49-50。

⁴⁴ 研究元代基督教史，必看《大興國寺記》，猶如研究唐代景教史，必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職是之故，元代樹立於鎮江的這方大興國寺碑文，數十年來已有不少中外學者撰文研究。最近的研究請詳邱樹森，〈“大興國寺記碑”研究〉，氏著，《元代文化史探微》（海口市：南方出版社，2001），頁357-383；殷小平，〈從《大興國寺記》看元代江南景教的崛起〉，《中華文史論叢》總84（2006）：289-313。

⁴⁵ 《元史》卷一二二，〈按扎兒傳〉內，「皇第四太子」指拖雷，亦係明確無疑者。似此之類，不備舉。

上太皇肯定就是拖雷。⁴⁶ 第二個太字疑是衍字。無論如何，當羊歸、熊自得等人說及太上皇，時人應當是明白其所指的。太廟裡拖雷神主牌位上的字「太上皇也可那顏」可能讓元朝人一提到太上皇就想到拖雷，除非說話、行文時，不管是明示或暗示，讀者或聽者都明確知道別有所指。⁴⁷

唐妃在《秘史》裡以其名字 Sorqaytani 加上稱號 Beki 出現，明初音譯作莎兒合黑塔泥別乞。《親征錄》未見她的名字。《元史》稱呼她，或以名唆魯和（禾）帖尼，或以諡號莊聖等。《元史》兩次出現別吉太后，肯定就是唐妃。⁴⁸ 另有幾處單作別吉，疑亦指唐妃。⁴⁹ 前揭一二四七年的《太清觀懿旨碑》，稱她為唆魯古唐妃。或是受到這一譯名的啓發，後來有人簡稱她為唐妃。世祖初年，李庭撰《奧屯世英神道碑》，具稱她唐妃，已見前述。前揭〈順帝紀〉內太上皇之後的唐妃，以及《析津志·原廟·行香》篇內的唐妃娘娘阿吉剌，都是指她。元人說元代人物，唐妃何指，人人清楚。但是，〈太宗紀〉「詔以真定民戶奉太后湯沐」的太后，恐怕未必如此。前文疑此句係因更動原始分封名單中唐妃之名為太前一詞而來。姑毋論所疑是否正確，其極易誤導讀者十分明顯。對於這種陷阱般的文字，明初史臣應負最大責任。

⁴⁶ 參看拙文，〈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 5。又，《元史》卷六八，〈禮樂志二·制樂始末〉，頁1699云：「仁宗皇慶二年秋九月，用登歌樂祀太上皇睿宗于真定玉華宮。」仁宗為拖雷第四代孫，而志文中用太上皇一詞，可知太上皇並非必然指稱今上之父也。太上皇、睿宗連文並讀，意謂一人，當不致於誤解為太上皇某人與睿宗皇帝二人也。

⁴⁷ 波斯史家志費尼（Ata-Malik Juvaini, 1226-1283）於一二五〇年代成書的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稱拖雷為 Uluy Noyan（兀魯合那顏）。突厥文 uluy，與蒙文 yeke 同，皆意為「大」。著名的蒙元史學者包意樂（John A. Boyle，或譯波伊勒）認為拖雷死後，名字（意為鏡子）成為禁忌，於是乎人們用 uluy noyan ~ yeke noyan 來稱呼他。我不同意這個意見，認為拖雷生前已有此一尊稱，也可那顏不是死後的稱號。以上見何高濟譯，包意樂英譯，《世界征服者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上冊，頁180，註1；拙文，〈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問題〉，《漢學研究》23.1 (2005): 481-489，第四節，〈上位名字〉。關於蒙古人的稱謂禁忌和稱號問題，還可繼續討論，茲不贅。

⁴⁸ 參見〈唐妃娘娘阿吉剌考〉。

⁴⁹ 例如卷一九，〈成宗紀二〉，頁410，大德元年三月庚寅條，「賜……別吉轄匠萬九百餘錠」。卷八五，頁2142，〈百官志一·兵部·隨路諸色民匠打捕鷹房等戶都總管府〉條，「掌別吉大營盤事及管領大都路打捕鷹房等戶」。同前頁，〈管領本位下打捕鷹房民匠等戶都總管府〉條，「掌別吉大營盤城池阿哈探馬兒一應差發、薛徹干定王位下事。泰定元年始置」。這三處別吉指誰，尚待確認。

五・皇太子、皇帝之子

《元史》倉卒成書，紕漏甚多，經清代學者證誤、補遺、考異者何啻數千條。同名同譯（元有五伯顏、四脫脫之說）以及同人異譯（如速不台、雪不台、唆伯台）的現象觸處皆是，最遭詬病，卻非最難考定。最難正確考定的是那些不使用個人專屬名號，卻以太后、太上皇之類普通詞彙稱之的人物。除了前揭〈太宗紀〉、〈順帝紀〉所見者外，《元史》他處所見此類人物所指何人，有時還得費神去查明。例如〈英宗紀二〉，至治二年三月己丑條云，「以國用匱竭，停諸王賞賚及皇后答里麻失里等歲賜」。⁵⁰屠寄在其《蒙兀兒史記》同條夾注說，「答里麻失里，仁宗次后，見后妃舊表。舊紀稱皇后答里麻失，音不備。且不加先朝二字，疑爲英宗后矣」。⁵¹較之前揭〈太宗紀〉上孤零零的太后之稱，〈英宗紀〉此處皇后有名可稽，故而查明身分，尙稱不難。但是〈順帝紀〉如下這則記載——元統元年十月「庚辰，奉文宗皇帝及太皇太后御容於大承天護聖寺」⁵²——其中的太皇太后，何許人也，就得花工夫去考查。我們引用史文，碰到這類人物，最好先弄清楚說的是誰。⁵³

皇后、太后、太上皇、太皇太后，都是漢人國家體制內的身分稱謂，歷史悠久，含義固定，官民人等皆知其所指。元代蒙古人接受並使用這類詞彙，是否真正了解其含義，是一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們或可藉以測知蒙古人對漢文化的了解程度，甚至冀望它能幫助我們了解《元史》等文獻中出現這類詞彙之故。

按元代之前，蒙古人沒有建立國家的經驗，不可能產生類似的稱謂詞彙。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以後，皇帝稱「汗」(qan)，窩闊台起稱「可汗」(qa'an)；皇后稱「可敦」(qadun~qatun)，有長次之分。⁵⁴汗、可汗、可敦等稱謂，都是借

⁵⁰ 《元史》卷二八，頁621。

⁵¹ 《蒙兀兒史記》卷一一，頁11上。

⁵² 《元史》卷三八，頁818。

⁵³ 此類記載，不獨見於《元史》，元代其他文獻亦常有之，茲舉一例如下。王耀庭，〈蒙元王朝后圖像〉，《故宮文物月刊》22.10 (2005)：58-71，引佚名撰《元代畫塑記》（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有一段文字，讀作：「英宗皇帝至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太傅朵得左丞善僧院使明里董阿進呈太皇、太后、英宗皇帝御容，汝朵得善僧明里董阿即令畫畢復織之。」三個人名朵得、善僧、明里董阿不加標點，不便讀者；分太皇太后（順宗后答己，英宗祖母）為太皇、太后，則誤矣。

⁵⁴ 前揭一二四〇年懿旨起首語中的「也可皇后」即大皇后。《元史》中亦出現「二皇后」（卷八九，頁2268；卷一〇六，頁2694；卷一四〇，頁3370）、「三皇后」（卷四一，頁

詞，蒙古之前的北方草原游牧國家已經使用數世紀。一二六〇年成吉思汗孫忽必烈即位，定都中原，附會漢法，中國傳統的典章制度於是乎逐漸重現在元代的國家體制中。在這方面，與本文此處所論關係最為密切者厥為制定尊諡與廟號，上皇帝尊號，以及冊立太子、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等。

皇帝生時的尊號與死後追贈的諡號和廟號，大抵都是使用抽象的詞彙。這是歷代皆然之事，元代亦不例外。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尊號曰「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⁵⁵ 諡號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⁵⁶ 這些抽象詞彙，一般讀書人可能都不甚解，遑論認識漢字不多或者根本不識漢字的蒙古皇帝。由於尊號、諡號、廟號，都是個人專稱，所以文獻上出現這些人物時，我們不會認錯對象。困擾我們的是那些沒有加上專稱（姓氏名字亦為專稱）或其他足資辨識其人身分的稱謂詞彙。前文已詳加考辨的《元史·太宗紀》內的「太后」即為顯著之例。對於這類非抽象稱謂詞彙，部分元朝皇帝及其臣從也只是一知半解，不甚了然。有些事例可以為證。

首先是與稱謂詞皇太子有關的兩件史事。按周天子及諸侯之子具可稱太子，或稱世子，並不嚴格。自漢以後，皇帝立為嗣君的嫡子始可稱為太子或皇太子。但是北方民族在中國建立的王朝改變了這種情況。金朝對太子名號使用甚為疏闊，如兀朮亦稱四太子。元朝文獻使用太子一詞最為泛濫。前揭《親征錄》有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四太子之稱。我們幾乎可以說，成吉思汗黃金氏族的男性子嗣大概都可以自稱或他稱太子。與太子一詞同樣泛濫使用的是諸王之稱。《元史》卷一〇八為〈諸王表〉，表前序言說，「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⁵⁷ 表內列有「無國名者」與「無國邑者」。⁵⁸ 可見有無封國王號，都可稱

880；卷一〇六，頁2693, 2694；卷一二一，頁2994）、「第二皇后」（卷一一四，頁2879, 2880；卷二〇四，頁4551）、「次三皇后」（卷一四三，頁3418）等詞。學者爭論中的「六皇后」則屢見不一見，茲不舉。

⁵⁵ 此為群臣於至元二十一年正月乙卯所上；見《元史》卷一三，〈世祖紀十〉，頁263。

⁵⁶ 此為成宗於至元三十一年五月戊午所上；見《元史》卷一七，〈世祖紀十七〉，頁376；卷一八，〈成宗紀一〉，頁383。廟號世祖同上於是日。又，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例如忽必烈曰薛禪（sečen），成宗曰完者都（öljeitü），一般認為是死後諡號，我則以為是生前已經有之的尊稱，死後則沿用為諡號。說詳拙撰，〈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問題〉。

⁵⁷ 《元史》卷一〇八，〈諸王表〉，頁2735。

⁵⁸ 同前文，頁2744, 2748。按：元代公主名號使用之濫與諸王等。同書次卷〈諸公主表〉序：「且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概稱焉。」《元史》卷一〇九，〈諸公主表〉，頁2757。

爲王。就太子與諸王而言，個人翻閱元代文獻有個印象：世祖即位（1260）之前的大蒙古國時代，太子一詞似較諸王用得普遍；世祖以後的元朝則多用諸王，少用太子；太子一詞已逐漸由概稱皇室男性成員轉爲意指皇位繼承人，惟應注意：只有被選定爲皇位繼承人的太子方能稱爲皇太子。這一轉變，以世祖爲分水嶺。大蒙古國時代，汗位繼承原則並不明確，太祖成吉思汗和太宗窩闊台可汗生前雖曾指定繼承人，但所指定的繼承人並不能享有儲君名號的保護。成吉思汗指定的繼承人窩闊台的繼位過程並不順利。窩闊台先指定第三子闊出爲繼承人。闊出戰死，又指定闊出之子失烈門，但又曾說四弟拖雷之子蒙哥「可以君天下」，自相矛盾，而汗位最後卻是另子貴由坐上。⁵⁹ 大蒙古國時代並無明確的汗位繼承制度。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恢復漢法，改變了這種狀況。一二六〇年即位之後幾經漢人儒臣先後一再請命，他終於在至元十年（1273）二月正式冊立皇子真金（Jingim）爲皇太子。相關的一些措施和太子冊文明確的宣示皇太子是唯一的皇位繼承人。《元史》卷八〈世祖紀五〉，「二月丙戌，以皇后、皇太子受冊寶，遣太常卿合丹告于太廟」。⁶⁰ 告于太廟，顯見忽必烈冊立皇太子，建立儲君制度的意志。真金未即位而卒（1286），被迫諡爲裕宗皇帝。《元史》卷一一五〈裕宗傳〉載錄他的受冊文：

十年二月，立爲皇太子，仍兼中書令，判樞密院事。受玉冊：「皇帝若曰：咨爾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皇帝遺訓，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豫選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紹隆丕構。自時厥後，爲不顯立冢嫡，遂啟爭端。朕上遵祖宗宏規，下協昆弟僉同之議，乃從燕邸，即立爾爲皇太子，積有日矣。比者，儒臣數奏，國家定立儲嗣，宜有冊命，此典禮也。今遣攝太尉、左丞相伯顏持節授爾玉冊金寶。於戲！聖武燕謀，爾其承奉。昆弟宗親，爾其和協。使仁孝顯于躬行，抑可謂不負所托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九月丙戌，詔立宮師府，設官屬三十有八員。起處士楊恭懿于京兆。⁶¹

這篇冊文明確宣示皇太子就是儲嗣，就是汗位繼承人。自世祖時代起，黃金氏族的男性成員通稱諸王，不再（或者很少）自稱或他稱太子，應當是因此之故。

⁵⁹ 參看蕭功秦，〈論大蒙古國的汗位繼承危機〉，《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5（1981）：48-59。

⁶⁰ 《元史》卷八，頁148。

⁶¹ 同前書，卷一一五，頁2889。

真金卒後，世祖未再立皇太子。世祖死後，成宗繼位。他是真金之子，沒有皇太子的頭銜，他的繼位是宮廷政治運作的結果。⁶² 他有二子，一早夭，一名德壽。⁶³ 德壽大約生於父汗即位後之第三年，大德元年（1297）。大德九年六月被立為皇太子，但當年十二月即告死去，無後。成宗未再立太子。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死，引發了另一場帝位爭奪戰。大皇后卜魯罕（Buluqan）謀立真金弟安西王忙哥剌（Mangala）之子阿難答（Ananda）為帝。被卜魯罕皇后貶去懷州的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Darmabala，此時已卒）之子愛育黎拔力八達（Ayurbaribada，即後來的仁宗），則奉其母答己（Dagi）趕回京師發動一場政變。⁶⁴ 政變成功，反對派或被誅殺或被繫獄。有人勸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早正天位，但仁宗表示皇位應屬長兄海山（Qaisan，即後來的武宗）。海山坐鎮漠北多年，手握重兵，也自以為是神器所當歸。仁宗於是遣使北迎武宗。五月二十一日，武宗即位；六月初一日，詔立仁宗為皇太子。⁶⁵ 《元典章》載錄了武宗的〈建儲詔〉：⁶⁶

大德十一年六月□日，欽奉皇帝聖旨：「朕承列聖之貽謀，協宗王之翊戴，必謹親賢之託，共成繼述之功。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性稟溫文，行全孝敬，夙著忠勤之節，素明治理之方。載惟靖亂之殊勳，式副元良之渥命，乃遵裕皇居東宮舊制，於六月朔旦（1307.06.30）授以皇太子金寶，俾領中書之務，仍兼宥密之司。匪特敦兄弟友愛之情，寔以衍宗社隆昌之祚。咨爾多方，體予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按皇太子含有兩層意義，一是表示皇太子其人與皇帝之間的父子人倫關係；二是表示皇太子其人為皇位的唯一合法繼承人。元世祖冊立真金為皇太子，成宗冊立

⁶² 參看李則芬，《元史新講》（臺北：中華書局，1978），第3冊，第二十二章，〈成宗朝十三年〉，第二節，〈成宗鐵穆耳嗣位的秘密〉。

⁶³ 德壽生母，《元史》謂為成宗元妃失憐答里，波斯拉斯特丁《史集》謂為大皇后卜魯罕，陳得芝認為當從《史集》；見〈耶律楚材、劉秉忠、李孟合論——蒙元時代制度轉變關頭的三位政治家〉，《元史論叢·第九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頁1-22；後收入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631-664。陳說見頁655，註3。

⁶⁴ 答己，《元史》卷一一六，〈后妃傳二〉有傳；見頁2900-2902。《元史》諸后妃傳中，答己的傳篇幅最長。

⁶⁵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頁480，大德十一年六月「癸巳朔，詔立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受金寶」。

⁶⁶ 《元典章》卷一，頁7下。

德壽爲皇太子，具保全了皇太子一詞的兩層含義。武宗冊立文宗爲皇太子，以弟爲子，皇太子一詞遂失去了原有的第一層含義。推測武宗、仁宗等蒙古人就是把皇太子一詞作爲汗位繼承人來了解的。⁶⁷ 應當注意，武宗〈建儲詔〉的起草人極其可能是漢人文臣，這位撰文者以及當時朝中文人當然明白皇太子一詞內含的父子人倫關係。他們竟然無視於武宗、仁宗實爲兄弟的事實，而依然把武宗選擇仁宗爲繼承人視同冊立皇太子，可能是無先例可循，⁶⁸ 而又無法創造適當的詞彙來描述皇兄太弟兩人當前的角色故也。要之，皇太子一詞在元朝蒙古人的語彙裡，應當是借來指稱皇位繼承人的漢語借詞，而在位皇帝與皇太子之間是否具有父子關係不論也。

武、仁故事不久再度上演。這次的主角是武宗的兩位兒子：明宗和世琜 (Qošila)、文宗圖帖睦爾 (Tuy Temür)。致和元年七月十日，泰定帝卒于上都。皇太子阿剌吉八 (Arigiba) 即位，改元天順。武宗次子懷王圖帖睦爾 (母唐兀氏) 自金陵入京師，九月十三日壬申，即皇帝位于大都，是爲文宗，改元天曆。汗位爭奪演變爲兩都之戰。十月中旬，上都兵敗，天順帝不知所終。十一月二十二日庚辰 (1328.12.23)，勝利的文宗遣使奉迎皇兄和世琜 (武宗長子，母亦乞烈氏) 於漠北。天曆二年正月二十八日丙戌 (1329.02.27)，和世琜即位于和寧 (和林) 之北，是爲明宗。明宗旋即南下中國。四月癸卯，明宗於途中遣使立文宗爲皇太子。七月二十一日丙子 (1329.08.16)，文宗受皇太子寶。八月乙酉朔 (1329.08.25)，明宗次于王忽察都 (又譯旺兀察都，今河北張北縣北)。二日丙戌，文宗入見，明宗宴帝 (文宗) 及諸王、大臣于行殿。六日庚寅

⁶⁷ 仁宗入京鏟除反對派後，表示無意於大位，願奉兄海山爲帝。但其母答己卻命陰陽家推算兩子星命，結果是兄凶弟吉，因遣近侍以此傳告海山。素有大志的海山派親信康里脫脫「往察事機」。《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脫脫傳〉，頁3322載：「脫脫馳至大都，入見太后，道武宗所授旨以聞。太后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深愛。貪慾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時諸王禿列等侍，咸曰：『臣下翊戴嗣君，無二心者。』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留脫脫與語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速爲我彌縫闕失，使我骨肉無間，相見怡愉，則汝功爲不細矣。』脫脫頓首謝曰：『太母、太弟不煩過慮，臣侍藩邸歷年，頗見信任，今歸當即推誠竭忠以開釋太子。後日三宮共處，靡有嫌隙，斯爲脫脫所報效矣。』」答己、脫脫口中的太子即武宗，太弟爲仁宗，可見答己、脫脫亦視太子爲皇位繼承人的同義詞。

⁶⁸ 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不乏兄弟相繼爲帝的事例，但是元朝之前在位皇帝冊立其兄弟爲皇位繼承人的個例，似乎無聞。事實如何，尚待清查。

(1329.08.30)，明宗暴卒，文宗入殿，貓哭耗子。十五日己亥（1329.09.08），文宗再即位于上都大安閣。⁶⁹

明宗立文宗為皇太子及文宗受皇太子寶，《元史》〈明宗紀〉及〈文宗紀〉皆有記載，但具未言及有無相關的冊文或詔書。明宗在和林即位之後隨即南下，但在抵達上都或大都之前即已遇害。這位當了六七個月的旅行皇帝或者沒有中途製作冊文或詔書的條件。他也許頒布了相關冊文或詔書，後來卻在他的兒子順帝清算文宗殺父之仇時予以毀滅。⁷⁰真相為何，已難查明。我們無從得知明宗等人如何理解皇太子這個詞彙。推測和武宗立弟為皇太子先例一樣，明宗、文宗大約也是把皇太子單純理解為皇位繼承人，而不管這位繼承人究竟是在位皇帝的兒子或兄弟，或者是其他甚麼人。

要之，蒙元前期黃金氏族的男性成員大概都可稱太子。元朝以後，諸王一詞逐漸取代太子成為皇室男子的通稱。太子一詞恢復其為皇位繼承人的本義。但是，應當注意，元朝皇位繼承人的正式稱謂是皇太子。太子不再是皇太子的簡稱，兩者有所區別的。其次，由於武宗確定文宗為皇位繼承人，以母弟為皇太子，太子或皇太子一詞喪失了它原有的表示「在位皇帝與皇位繼承人」等於「父與子」的含義，⁷¹成為單純的皇位繼承人的同義詞。武、仁之後，歷史重演，皇兄明宗立異母弟文宗，亦稱為皇太子。皇太子不必然就是皇帝之子。翻閱元代文獻，不可不加以注意。⁷²

⁶⁹ 以上具見《元史》泰定、明宗、文宗三帝本紀各該年月日條，並參看拙編，《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附錄，〈元朝帝王錄〉。

⁷⁰ 文宗死後，明宗次子七歲的懿璘質班（母八不沙皇后，乃馬真氏）繼位，是為寧宗。寧宗在位不滿兩月即卒。繼位者是異母兄妥懽貼睦爾（母邁來迪，罕達魯氏），是為順帝。寧宗、順帝都不曾立為太子。他們的繼位主要是出於文宗皇后卜答失里的安排。順帝成年親政後，重紀至元六年（1340），他清算文宗殺父之仇，下詔撤去文宗廟主，徙文宗后卜答失里（時為太皇太后）於東安州，放文宗子燕帖古思於高麗（《元史》多處提到「太子」燕帖古思，無一說他為「皇太子」）。文宗被立為皇太子，若有冊文，恐難逃毀壞厄運。《元史·文宗紀》所本的《文宗實錄》雖完成於順帝開始清算鬥爭之前的至元四年，但日後遭到篡改不無可能。

⁷¹ 中國歷史上不乏皇帝無子，而以他人子為己子而後立為皇太子之例。

⁷² 拙稿修正期間，業師蕭啟慶院士賜正甚多，謹此敬致謝忱。業師指出，我對於元人使用稱謂詞「太子」與「諸王」的意見，與清代學者趙甌北的看法不盡相同。按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九有一條曰〈元帝子稱太子者不一〉，云：「古來儲君始稱太子，元制則帝子多以太子稱，不必繼體也。……國初時，正宮皇后所生，雖非冢嫡，亦稱太子，其餘則稱王。中葉以後，則非中宮所生亦稱太子，命為繼體者，則稱皇太子。」見王樹

六・皇太后、太皇太后

元人使用傳統稱謂詞彙，取其固有含義之一而無視於其他含義者，皇太子之外，還有一些。今取元人曾經爭議的太皇太前一詞爲論。

元代后妃先後有幾位被冊立爲太皇太后。泰定帝嘗欲加號某一太后爲太皇太后，因有人反對而作罷。此事見載於《元史》卷一四三〈自當傳〉，云：

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議之。自當獨曰：「太后稱太皇太后，於典禮不合。」皆曰：「英宗何以加皇太后（引者按，答己）號曰太皇太后。」自當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⁷³

這件事發生於泰定二年（1325）至五年之間。〈泰定帝紀〉失載。太后何人，殊難確定。玩味文義，這位太后若非泰定帝的生母，則爲他的庶母，顯宗之妃。我

民，《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訂補本，2001），下冊，頁674-675。趙氏和鄙人對於元人稱太子、稱王（含自稱和他稱）的議論確實不盡相同。趙氏是以皇子爲議論對象，彷彿認爲中葉以後皇子，不論是否出自正宮，亦稱太子；我是以成吉思汗的男性子嗣爲議論對象，認爲世祖以前，成吉思汗的男性子嗣多稱太子，以後則多稱諸王。趙氏言曰「大概」，我則坦陳「印象」（見本文頁754），反映一個事實：無人能網羅無餘、精確統計元人稱太子、稱王的人數多寡及其前後變化。我們一致無異議的是：「太子」在元代是泛稱，惟有「皇太子」才是真正的皇位繼承人。趙氏《劄記》次卷，另有一條曰〈弟爲皇太子，叔母爲太皇太后〉，云：「武宗立弟仁宗爲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爲皇太子，蓋以皇太子爲繼體儲君之名號，不論輩行也」；見《廿二史劄記校證》，頁709。趙甌北以寥寥數筆概括了他的正確觀察，我不過演繹其說，詳述傳統詞彙在元代發生詞義變化的始末因緣罷了。我並未討論蒙古文中相對應的詞彙或相關的漢語借詞。《秘史》可見捏坤太子、合答安太子、阿鄰太子、台帖木兒太子、失列門太子等具有太子稱號的人物；見《秘史》第五〇、五三、五四、五六、五八、一二二、一三〇、一五二、一七〇、一七一、一七七、一七九等節。他們可不是被指定的皇位繼承人。書中也有多位被稱作「大王」的人，如成吉思汗之子拖雷，之孫巴禿等；見《秘史》第二七二、二七四節。可是應當注意，「大王」的對應蒙古文是 *kö'ün*（音譯作「口／可溫」；複數「大王每」*kö'üd~kö'üt*，音譯作「口／可兀惕」），書面語作 *köbegün*，意爲孩子、兒子。大蒙古國時代，可汗之子、貴族首領之子、乃至於百姓僕隸之子，皆稱 *köbegün*，沒有分別。《秘史》或譯爲「子」，或譯爲「大王」，意義儼然不同，其實這是明朝初年《秘史》翻譯者的附會。我們不能撇開蒙古原文於不顧，單憑後人選擇性的譯文譯字，遽而判定實際上都稱爲 *köbegün* 的人，有的有「大王」之稱，有的則無有。總之，蒙元時代的文獻性質及其中的漢語稱謂詞彙的意義，必須分別對待，辨識清楚。

⁷³ 《元史》卷一四三，頁3418。

們確定她不會是生母普顏怯里迷失（顯宗妃），因為這時她已不在人間。⁷⁴ 至於是哪位庶母，已不可考。⁷⁵ 《元史·自當傳》所據的原始文獻稱呼此一太后，是僅僅使用太后兩字，抑或是原有徽稱或姓名而後來被刪去了，同樣不可考。⁷⁶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斷定，自當認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尊稱是有輩分之別，不可亂用的。他的意見「合乎典禮」，即合乎太皇太后一詞的傳統含義也。參加討論的其他人員，也許沒有漢人，並不了解太皇太后的固有意義。在他們的觀念中，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似乎沒有輩分的差別，不同只在於前者比後者高一級，較尊榮。

太皇太后地位高於皇太后這一觀念，也反映在文宗卜答失里皇后的尊號由皇太后改為太皇太后一事上。⁷⁷ 文宗在天曆元年（1328）搶先坐上皇位，隨即冊封卜答失里為皇后。⁷⁸ 文宗死（1332）後，卜答失里臨朝稱制，扶立明宗（文宗異

⁷⁴ 按泰定帝於至治三年（1323）九月四日在龍居河（今蒙古國克魯倫河）即位。隨即南下，十一月至大都。十二月十一日「戊辰，請皇考、皇妣諡于南郊，皇考晉王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皇妣晉王妃曰宣懿淑聖皇后」；見《元史·泰定帝紀一》，頁641。宣懿淑聖皇后即普顏怯里迷失；見《元史》卷一一六，〈后妃傳二·顯宗宣懿淑聖皇后傳〉。傳中抄錄追尊諡號的冊文，有「仰徽音之如在，慨至養之莫加」云云，可證泰定生母早已亡故。其夫晉王（即顯宗）卒于大德六年（1302），年四十。泰定即位時，她若尚在，亦已五六十歲矣。

⁷⁵ 《元史》卷一一六，〈后妃傳二〉只傳顯宗宣懿淑聖皇后，未傳顯宗其他妃子。卷一〇六〈后妃表〉顯宗位下列三人，一為宣懿淑聖皇后，二為拜拜海妃子，三為忽上海妃子。兩妃子均僅記其名，無任何其他文字說明。

⁷⁶ 自當，《元史》本傳謂為蒙古人。其兄回會，劉岳申撰有墓誌銘，謂哈剌乞台氏；見《申齋劉先生文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卷八，〈資善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回會墓誌銘〉，頁10上-14上。

⁷⁷ 卜答失里皇后（一譯不答失里），弘吉剌氏，《元史》卷一一四〈后妃傳〉有傳，甚簡略。傳稱「至元六年（1340）六月，詔去尊號，安置東安州，尋崩」。其生年及年壽，本傳不載，但可以考。按《元史》卷三八，〈順帝紀一〉，元統元年（1333）十月「丁丑，依皇太后行年之數，釋放罪囚二十七人」。元統元年二十七歲，則生於大德十一年（1307），歿時（1340）壽三十三歲。

⁷⁸ 天曆元年九月十三日文宗即位。十二月「己亥，造皇后玉冊、玉寶」；見《元史》卷三二，〈文宗紀一〉，頁722。二年正月「辛未，以冊命皇后，告于南郊」；見〈文宗紀二〉，頁728。「己卯，以冊命皇后，告于太廟」；同前文，頁729。二月「辛卯，帝御大明殿，冊命皇后雍吉剌氏」；同前文，頁730。「十一月乙卯，以立皇后，詔天下」；同前文，頁744。《元史》卷一一四，〈后妃傳一〉本傳，頁2877-2878的記載較簡略，云：「天曆元年，文宗即位，立為皇后。二年，授冊寶。」

母兄)七歲的兒子寧宗(1333)。卜答失里被尊為皇太后。⁷⁹ 童子皇帝旋即升天。卜答失里又立明宗另子,年方十四的順帝(1333-1370,寧宗異母兄),改元元統。元統元年十二月「乙亥,為皇太后置徽政院,設官屬三百六十有六員」。⁸⁰ 二年十月「己卯,奉玉冊、玉寶,上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仁壽徽懿昭宣皇太后」。⁸¹ 卜答失里的尊號冠上了十個字的徽稱。其後數月之間,舉行了一系列與尊號有關的典禮:至元元年(1335)二月「己卯,以上皇太后冊、寶,遣官告祭天地」。三月「辛卯,以上皇太后寶、冊,遣官告祭太廟」。「五月壬午朔,皇太后以膺受寶、冊,恭謝太廟」。⁸² 七月,蒙古蔑兒乞氏的權臣伯顏(Bayan)清除了欽察人燕鐵木兒(El Temür)家族的勢力,獨任右丞相,被賜予至高無上的封號答剌罕(Darqan)。是月戊申發布的詔書中言及順帝的叔母卜答失里皇太后:

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為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⁸³

按文宗三子,第三子太平納(原名寶寧)早卒無後。長子阿剌忒納答剌,至順元年(1330)十二月五日,立為皇太子,次年正月十五日即歿。⁸⁴ 其後文宗不再立皇太子,並且留下皇位由明宗之子來繼承的遺命。次子燕帖古思(原古納答剌),在父皇駕崩(1332)後,雖有權臣燕鐵木兒的支持,但因父皇遺命及母后卜答失里的反對,無緣當上皇帝。卜答失里先立寧宗,寧宗死,繼立順帝,故言「後其所生之子」。這通詔書表達了順帝的感恩之情。它是出自少年皇帝的真心,或是翰林詞臣的表面文章,抑或是現實政治的運作結果,我們很難判斷。無

⁷⁹ 依年月先後排比相關史料,可知臨朝稱制的卜答失里皇后晉陞自己為皇太后的工作相當積極。《元史·寧宗紀》至順三年九月「辛巳,修皇太后儀仗」;十月四日庚子,寧宗即位。九日「乙巳,造皇太后玉冊、玉寶。丁未十一日,皇太后命作兩宮幄殿、車乘、供張」;十一月八日「甲戌,遣宿衛官阿察赤以上皇太后玉冊告祭南郊,中書平章政事伯撒里告祭太廟。戊寅十二日,奉玉冊、玉寶尊皇后曰皇太后。皇太后御興聖殿受朝賀」;「壬辰二十六日,帝崩,年七歲」。以上見《元史》卷三七,頁810,812-813。

⁸⁰ 《元史》卷三八,〈順帝紀一〉,頁819;卷九二,〈百官志八·選舉附錄·徽政院〉條,頁2330。

⁸¹ 同前書,卷三八,〈順帝紀一〉,頁824。

⁸² 依序見前書,卷三八,〈順帝紀一〉,頁825,826,826。

⁸³ 同前書,卷三八,〈順帝紀一〉,頁827。

⁸⁴ 同前書,卷三五,〈文宗紀四〉,頁770,773。

論如何，詔書表明：嫡母卜答失里由皇后而皇太后，由皇太后而贊天開聖仁壽徽懿昭宣皇太后，仍不足以比侔她的隆功盛德。如何加禮成爲一個問題。有人提出改變尊號的意見。《元史·順帝紀一》至元元年（1335）八月己卯條：

議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許有壬諫以為非禮，不從。

〈許有壬傳〉的記載比較詳細，雖然把廷議時間錯繫在元統二年九月：

明年甲戌（1334），……九月，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羣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為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非禮也。」弗之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之聽。⁸⁵

朝廷考慮的不是合禮、非禮的問題，而是卜答失里的名位如何提高的問題。廷議有了結果，後續的工作於焉展開：

至元元年九月庚子，「命有司造太皇太后玉冊、玉寶」。⁸⁶

十月「辛未，太皇太后玉冊、玉寶成，遣官告祭于太廟」。⁸⁷

十二月「乙丑，奉玉冊、玉寶，上太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徽懿昭宣貞文慈佑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詔曰……」⁸⁸

至元三年二月「壬午，以上太皇太后玉冊、玉寶，恭謝太廟」。⁸⁹

四月「甲戌……皇后以受玉冊、玉寶，恭謝太廟。……以太皇太后受冊、寶詔天下」。⁹⁰

卜答失里的尊號由皇太后改為太皇太后，加了個太字；徽稱由原來的十個字上加了八個字。徽稱、諡號等的加字通稱加號。加號表示更尊崇、更榮貴。成吉思汗原諡聖武皇帝，加諡法天啓運聖武皇帝；⁹¹ 孔子原封文宣王，元時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⁹² 唐妃娘娘原諡莊聖皇后，加諡顯懿莊聖皇后。⁹³ 武、仁二宗生母

⁸⁵ 《元史》卷一八二，頁4201。

⁸⁶ 《元史》卷三八，〈順帝紀一〉，頁828。

⁸⁷ 同前文，頁829。

⁸⁸ 同前文，頁830。

⁸⁹ 《元史》卷三九，〈順帝紀二〉，頁838。

⁹⁰ 同前文，頁839。

⁹¹ 《元史》卷一，〈太祖紀〉，頁25。

⁹² 加封孔子，事在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辛巳（1307.08.17）；見《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頁485。大德是成宗的年號。此時成宗已死（1307.02.10），武宗已即位。

答己在世時，武宗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徽稱十個字；仁宗時加號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加了六字。⁹⁴ 卜答失里由不帶美稱的陽春皇太后，一而為擁有十個字徽稱的皇太后，再而為擁有十八個字徽稱的太皇太后，名位顯然是步步高升。順帝君臣不顧許有壬的反對，無視於皇帝與嫡母的輩分，堅持改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可見在他們的觀念裡，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區別，不在於輩分的不同，而在於名位的高低。順帝君臣和太皇太后卜答失里並不十分了解皇太后與太皇太后的真實意涵。⁹⁵

七·殷鑒

元代皇帝可以冊封兄弟為皇太子，以兄弟為子，可以冊封諸母為太皇太后，以母為祖母，皆悖離了中國傳統稱謂詞彙的固有含義。我們不須責備馬上起家的蒙古人誤用了漢語借詞，倒是應當警惕自己小心解讀元代文獻中的這類傳統語彙。⁹⁶ 稍一不慎，我們可能指鹿為馬，張冠李戴。成吉思汗的媳婦，睿宗（二代）之妃，四帝之母，蒙元史上著名的莎兒合黑塔泥別吉，一則被派為太祖（一代）的皇后，再則被派為定宗（三代）的皇后，三則被派為明宗（七代）的皇后，身兼數角，忽古忽今，都是後人亂點鴛鴦的既有成果。後之來者假如固守漢語傳統詞義，不察蒙元文獻的特殊性質，這位唐妃娘娘或者又要扮演更多的角色，歷史更加撲朔迷離！

（本文於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收稿；九十九年四月十五日通過刊登）

(1307.06.21)，尚未改元。屢見近人謂元成宗時加號孔子云云，誤也。

⁹³ 《元史》卷一一六，〈后妃傳二〉，頁2897。

⁹⁴ 同前文，頁2901。

⁹⁵ 十四歲即位的順帝，隨年事的漸長，對於生父明宗遇害故事，應有所聞知。至元六年，他二十一歲。二月，他罷黜權臣伯顏。六月，他撤去文宗廟主，放逐卜答失里和燕帖古思，兩母子尋卒。順帝在詔書中譴責卜答失里說：「不答失里本朕之嫡，乃陰構奸臣，弗體朕意，僭膺太皇太后之號，迹其閭門之禍，離間骨肉，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安置。」見《元史》卷四〇，〈順帝紀三〉，頁856。僭膺云云，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⁹⁶ 疑元廷使用公主、長公主、大長公主，也有不論輩分的情況。茲不具論。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不著撰人，《大元通制條格》，北平：北平圖書館影印明初墨格寫本，1930。

不著撰人，《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印元刻本，1972。
簡稱《元典章》。

不著撰人，《元代畫塑記》，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不著撰人，《元朝秘史》，收入《四部叢刊·三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簡稱《秘史》。

不著撰人，《聖武親征錄》，收入王國維，《蒙古史料四種校注》。簡稱《親征錄》。

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

王國維，《蒙古史料四種校注》，北平：清華學校研究院，1926。

王樹民，《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訂補本，2001，下冊。

何秋濤，《校正元聖武親征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第423冊，據清光緒小溫巢刻本影印。

何高濟譯，志費尼（ʿAta-Malik Juvaini）著，包意樂（John A. Boyle，或譯波伊勒）英譯，《世界征服者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28冊。

沈濤，《常山貞石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18冊，據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序刊本影印。

屠寄，《蒙兀兒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

彭大雅，《黑韃事略》，收入王國維，《蒙古史料四種校注》。

程鉅夫，《雪樓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洪武本，1970。

程鉅夫，《雪樓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第1202冊。

趙珙，《蒙韃備錄》，收入王國維，《蒙古史料四種校注》。

劉岳申，《申齋劉先生文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

洪金富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3冊。

de Rachewiltz, Igor, e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4, vol. I.

二・近人論著

王慎榮、葉幼泉、王斌

1991 《元史探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王耀庭

2005 〈蒙元王朝帝后圖像〉，《故宮文物月刊》22.10：58-71。

余大鈞

1988 〈論屠寄的《蒙兀兒史記》〉，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頁219-230。

李則芬

1978 《元史新講》，臺北：中華書局，第3冊。

邱樹森

2001 〈“大興國寺記碑”研究〉，氏著，《元代文化史探微》，海口市：南方出版社，頁357-383。

邱樹森主編

2002 《元史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姚大力

2006 〈“成吉思汗”還是“成吉思合罕”？——兼論《元朝秘史》的成書年代問題〉，《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100周年》，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頁202-219。

姚景安

1982 《元史人名索引》，北京：中華書局。

洪金富

1987 〈從「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權的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4：843-907。

2005 〈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問題〉，《漢學研究》23.1：461-494。

2008a 〈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1-40。

2008b 〈唐妃娘娘阿吉剌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41-62。

洪金富編

- 2004 《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殷小平

- 2006 〈從《大興國寺記》看元代江南景教的崛起〉，《中華文史論叢》總84：289-313。

祖生利

- 2000 《元代白話碑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語言系博士學位論文打印本。

張秀生、劉友恆、聶連順、樊子林編著

- 2000 《中國古代建築：正定隆興寺》，北京：文物出版社。

陳得芝

- 2004 〈耶律楚材、劉秉忠、李孟合論——蒙元時代制度轉變關頭的三位政治家〉，《元史論叢·第九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頁1-22；後收入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631-664。

陳捷、陳清泉譯

- 1963 《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楊鐮

- 1983 《貫雲石評傳》，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蔡美彪

- 1955 《元代白話碑集錄》，北京：科學出版社。

蕭功秦

- 1981 〈論大蒙古國的汗位繼承危機〉，《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5：48-59。

韓儒林

- 1985 〈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氏著，《韓儒林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頁304-349。

愛宕松男 (Otagi Matsuo)

- 1950 〈蒙古人政權治下の漢地に於ける版籍の問題——特に乙未年籍・壬子年籍及び至元七年籍を中心として——〉，《羽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京都：東洋史研究會，頁383-429。

照那斯圖 (Junast)

- 1991 《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II・文獻匯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洪金富

箭內互 (Yanai Watari)

1930 〈元朝斡耳朵考〉，氏著，《蒙古史研究》，東京：刀江書院，頁
663-768。

Cleaves, Francis W. (柯立夫)

1979 “The Initial Formulae in a Communication of a Mongolian Viceroy to
the King of Korea.” *Journal of Turkish Study* 3: 65-88.

Interpretations of Yuan Dynasty Source Materials: Imperial Titles

Chin-fu Hu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Yuan dynasty, which was established by the Mongols, differed in many respects from previous dynasties founded by the Han Chinese. This indicates that one cannot uncritically apply conventional wisdom about pre-Yuan Chinese dynasties to discussions of Yuan history. In order to explain changes in the meanings of traditional Han Chinese titles during the Yuan, this article draws on examples such as *taihou* (太后), *taizi* (太子), *taishanghuang* (太上皇) and *taihuangtaihou* (太皇太后), while also citing Han Chinese, Mongolian, Persian, and other source materials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mistakes caused by an inability to look beyond traditional Han Chinese meanings when interpreting Yuan source materials.

Keywords: Yuan dynasty, Yuan institutions, Yuan historiography, imperial titles